



名家百味文库
华文出版社

郭预衡 著

专门与博识

我有时想，如果我们的青年一代，不论是学文学的，学科学的，都能读一读鲁迅的著作，则不仅可以提高文化水平，而且可以提高思想修养和精神境界。这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状态的改善，都将具有很大的影响。

京)

名家百味文库

郭预衡 著

专门与博识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专门与博识/郭预衡著. 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1998.3
(名家百味文库)

ISBN 7-5075-0704-1

I. 专… II. 郭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0006 号

专门与博识

著 者: 郭预衡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责任编辑: 张惠军
封面设计: 李书英
版式设计: 赵培合
经 销: 新华书店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
电 话: 63099271 63097990
邮 编: 100800
印 刷: 科普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字 数: 180 千字
印 张: 8.875
版 次: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0001~6000 册
书 号: ISBN 7-5075-0704-1/I·195
定 价: 16.00 元

华文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
华文版图书, 印装错误, 随时退换

编者说明

这套《名家百味文库》，主要选编中国现代和当代部分有较大影响作者的作品。考虑到当前一些读者的需要，所辑录的文章侧重于杂文、随笔之类。首次推出的第一辑（共 11 册），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名家的代表性作品，兼顾了不同流派和风格，百花齐放，异彩纷呈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。

由于这套丛书的一些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，又受到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局限，某些文章在思想观念、学术观念、文艺观念等方面，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和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，有的仅是一家之言，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，应注意到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因素。

还应该说明的是，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，在行文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，以及翻译作品的地名、人名等方

面，与现在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，为尊重原著，保持原作的面貌，我们在编辑时基本上未作改动。

由于时间仓促和选编者水平有限，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、指教，以使第二辑的选编工作做得好一些。

目 录

前辈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向·····	(1)
谈“治学之道”·····	(9)
谈“一挥而就”·····	(17)
“鲁迅太左”发微·····	(22)
读姜季师《小说家之鲁迅》	
所想到的·····	(24)
关于鲁迅治学方法的探讨·····	(28)
专门与博识·····	(47)
鲁迅和中国古典文学·····	(50)
鲁迅笔下的爱情、婚姻和家庭·····	(65)
“遵命文学”及其他·····	(89)
鲁迅关于读书和写作的指导·····	(95)
做学问与写文章·····	(136)
做人和做学问·····	(146)
从读书到读帖·····	(149)
古文学习与写作·····	(153)

古人一条写作理论的继承和借鉴·····	(162)
怎样读明清散文·····	(179)
北朝三书的思想倾向和文风特点·····	(188)
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教育作用和 艺术特征·····	(204)
读宋文札记二则·····	(212)
李清照的文风、诗风和词风·····	(225)
朱元璋之为君和宋濂之为文·····	(238)
从《游侠列传》到《水浒传》·····	(254)
学风复古与文风复古·····	(260)
《纵横家研究》序言·····	(271)
《汉赋通论》序言·····	(274)

前辈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向

我是研究文史的，尚无成就。和前辈相比，读书甚少；和后辈相比，马齿徒增。虽伏案有年，却难说经验。只就学习经过，略谈二三。

一 读一点历史

我是上过大学和研究所的，算是有所谓“学历”。但我有一点书本知识，主要还是依靠自学。记得从抗日战争开始，由于一度不能入学，我便开始自学了。那时我还是少年，初中学生。因为在国文课本上读了岳飞的作品，又看了他的生平介绍，知道他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左氏春秋》，有些欣慕，于是便开始自学这两部书。在此后的

几年里，关于文史之类的书，我读了不少。我当时曾想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却没有借到，只读了《御批通鉴辑览》，其后又读了《史通》，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大有帮助。

鲁迅说：“无论是学文学的，学科学的，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。”我开始读历史的时候虽然还不知道鲁迅有这样的意见，但后来我想，在我开始自学的时候，先从历史入手，虽是事出偶然，却走上了鲁迅指引的路，不能不算幸事。

鲁迅是主张读史的，他说过：与其读经，不如读史。因为“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，指示着将来的命运”。而且，“一治史学，就可以知道许多‘古已有之’的事。”就是说，读史治史，不仅可以知古，而且可以知今，甚至可以推断未来。我觉得鲁迅的话是深刻的。他自己大概深得读史的好处，所以对于历史和现实都看得异常深远，文章也写得特别深刻，能见别人所不能见，能发别人所不能发。他之所以能够超出前辈和同辈的某些学者，原因虽不止于一个，但深于历史、独具史识，我看是重要的原因。

二 学习前辈的治学精神

因为读过一些文史方面的书，后来便在大学里学文，又在研究所学史，而且逐步走上了研究文史的路。钻进古

书里面去研究文史，在那时是容易脱离现实的。但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，我的几位老师作学问往往联系实际，这对我很有影响。

例如余嘉锡先生，是我在大学的启蒙老师。我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，我毕业后又留作他的助教。余先生的学问，不须我说；如果问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，我也不想说他那最擅长的目录学，这是不待言的。还有，余先生是深于考证之学的，有《四库提要辩证》在，这也不须我多说。我觉得他对后辈影响更大、最值得称道的，是他作学问并非仅仅埋头于文学考证、不仅仅服膺于几个乾嘉学者，而是追攀清初的几个大师，讲究经世致用。他常常引用顾亭林的下面这两句话：“无体国经野之志，不足以登山临水，无济世安民之略，不足以考古证今。”这两句话体现着顾亭林的治学精神，也反映了余先生的志趣所在。

余先生写于这个时期的文章也表现了这样的志趣。例如《杨家将故事考信录》一文就是有为而作的。其序言有云：

今之戏剧，多出于小说，杨家将诸剧，虽脍炙人口，然以写潘美为奸贼，为人所诟病。余以为此实元人之遗说，未必毫无所本。于是发愤取群书考之，……既得业之始末，因遍读元人书，而得刘因郝经之诗，皆以宋之亡，归咎于不取燕云。益信杨家将虽小说而实一时人心之所同。

……

他身在沦陷之区，而作这样的考证文字，其所欲“致

用”者，不言可知。

我上研究所，导师是陈垣先生。我应考的试题就是陈先生出的。四题我只答了两个，所答的题目已经不记得了。但我未能作答的一个难题，却至今记得，即：“端平入洛之师”。当时面对这个题目，文章实在难作。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有这条目，他也没讲清楚。但陈先生以此命题，对我是有启发的。他大概和余先生同样，身居沦陷之区，凡所论著，往往和现实相关，出这考题，也不例外。

陈先生的学问，也不须我多讲。他当时讲授的亭林之学、谢山之学以及佛教史籍等等，更不必多说。但我以为先生治学的根本精神，也是往往结合实际，最应该称述。他在《通鉴胡注表微·小引》中有下面一段话：

频年变乱，藏书渐以易粟，唯胡氏覆刻元本《通鉴》，尚是少时读本，不忍弃去。……杜门无事，辄以此自遣。一日读《后晋纪》开运三年胡注有曰：“臣妾之辱，唯晋宋为然，呜呼痛哉！”又曰：“亡国之耻，言之者痛心，矧见之者乎！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。天乎人乎！”读竟不尽凄然者久之。

又说：

自考据学兴，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。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？其忠爱之忧见于《鉴注》者，不一而足也。

这些话是讲胡身之（三省）的生平抱负和治学精神

的。但我以为，陈先生的治学精神，于此也可察见。

陈先生也是深于考证之学的。他说过：“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，欲实事求是，非考证不可。”但是，他又说过：“史学之为用广矣，考据云乎哉！”从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陈先生治学精神之所在。

我后来学习鲁迅先生的著作，曾经注意他怎样看清人的考据之学，因为乾嘉以来的考据之学对于近百年来的学术影响甚大。鲁迅先生的意见对我有更进一步的启发。他一面肯定那“语必征实、忌为空谈”的清儒考据之学的成就；另一面他也批评那“专事研究错字、争论生日”的“奴才家法”，而称赞那“纵论唐宋、搜讨前明遗闻”的顾亭林等清初的学者。这使我更加相信作学问、包括考证之学，不能脱离实际。

因此，如果有人问我，学问应该怎样作，我自己真是无话可说，所能说的，就是前辈学者的这种治学精神。

三 遵循鲁迅的治学方向

研究所毕业以后，我虽然走上了研究文史的路，但刚一起步，方向便不很清楚。是沿着前辈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呢，还是另辟蹊径呢？时代正在变化，举足不免踌躇。大约有两年的时间，我读了一些前所未读之书。其中包括

《鲁迅全集》等著作。当我比较全面地读了鲁迅的著作时，我觉得自己好象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。这时已是全国大陆解放之际。我这时不仅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、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，而且觉得他也是伟大的专家学者。我以为世上的专家学者虽然日渐其多，但象鲁迅这样可称伟大者，实在难得。

在这以后，我又曾有两年的时间更进一步学习鲁迅的著作。本来，解放后的三十多年里，我坐下来读书的时间不是很多的，但其间有两年到国外教学，杂事很少，读书的时间倒是多了一点。我一面阅读马列的著作，一面重温鲁迅的著作，并且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，对于鲁迅的治学方向、道路和方法，又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思考。

这时我觉得，鲁迅作为专家学者，既继承了前辈的治学精神，又给后辈指出了新的方向。他不仅象清初学者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那样主张读史和治史，而且尤其提倡读杂史和野史，并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，以为改革的借鉴。鲁迅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，以及对于历代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，都远远超过了前人。他的文章，论列古今，针砭时弊，其深度广度，更是前所未有的。

还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不仅在理论上独具真知卓见，而且考证工夫方面也有过人之处。这一点是一般人不很注意的，甚至有人是不以为然的。因此，我在这里必须多说几句。

空言不如实例，这里即以鲁迅在《华盖集续编》中的

《关于〈三藏取经记〉等》的一段考辨文字为证。鲁迅说：

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》三卷，旧本在日本，又有一小本曰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，内容悉同，卷尾一行云：‘中瓦子张家印’，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，世因以为宋刊，然逮于元朝，张家或亦无恙，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，未可知矣。

日本德富苏峰氏是这本《诗话》的收藏者，对鲁迅这话提出了异议，说这书是“宋槧的稀本”，“决不容疑”。并引罗振玉的题跋，根据“驚”字、“敬”字的缺笔定为宋槧。

鲁迅反驳说：“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，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”，“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。前朝的缺笔字，因为故意或习惯，也可以沿至后一朝。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，而遗老们所刻的书，儀字还‘敬缺末笔’。非遗老们所刻的书，寧字玄字也常常缺笔，或者以甯代寧，以元代玄。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，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。”

以后，郑振铎讲到《唐三藏取经诗话》时，又曾引王国维的话，以为宋槧。鲁迅又在《二心集·关于〈唐三藏取经诗话〉的版本》一文里驳以下面的话：

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，而亦不宜墨守，世间许多事，只消常识，便得了然。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，史家则不然。故于旧书，不以缺笔定时代，如遗老现在还有将儀字缺末笔者，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；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，如我生

于绍兴，然而并非南宋人，因为许多地名，是不随朝代而改的；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，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，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。

鲁迅的识见，既不同于藏书家德富苏峰氏，又不同于前辈学者王国维和罗振玉，也不同于后辈专家郑振铎。我以为鲁迅的看法，确是史家的真知卓见，远非藏书家和某些学者所能企及。

因此，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作学问的方向、道路和方法，我不想谈那为某些人所津津乐道的乾嘉学者，也不想谈那为某些人所钦佩到五体投地的王国维、罗振玉等前辈专家，我以为从方向到方法都能给人新的启发的，还要首推鲁迅。鲁迅当年称赞章太炎，说过“先哲的精神，后生的楷范。”对于鲁迅，我也是这样看的。

当然，鲁迅是不容易学的。古人说“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。”就我来说，虽“中”亦未易得。这是个人才疏学浅，不是鲁迅的方向问题。

谈“治学之道”

近几年来时常收到相识或不相识的同志来信，要我谈谈治学之道。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：

某某同志：

我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，有志于进一步研究；但近两年来看到一些评论文章，我对于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一些疑问，得不到解决。我读过您的著作和文章，很希望得到您的指教。我的疑问是：

一、对于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应该怎样估计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否“与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保持着一种逆向关系”？是否有些研究者“陷于封闭系统而自足”？

二、您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有何见解？在“宏观”和“微观”两种方法之间，您倾

向哪一面？记得您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说自己对于宏观微观“都很茫然”。难道您对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否定吗？

三、我读您的文章，有个感觉，好像您是“言必称鲁迅”的。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去世了，在今天新技术革命的大趋势下，鲁迅的见解还用得上吗？战国时期，孟子“言必称尧舜”，显然是不识时务的。您想过这个问题吗？

四、这两年我还读了不少谈治学之道的文章，也就是讲怎样作学问。人们对于学问的看法好像并不相同，更不要说怎样治学了。您对于学问怎么看呢？您的治学之道可以告人吗？

在这几年收到的信件中，称我为同志的日渐其少了。人们大概以为“同志”一称，只是解放后才用。其实这是忘却了历史。在历史上，不仅解放前的中山先生临终之时曾有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云云的遗嘱，而且早在千百年前，“同志”一词，就已见诸称谓。凡有意气相投，包括夫妇之间，有时都称“同志”。这封来信，仍以“同志”称我，有如“空谷足音”，因此，我也仍以“同志”视之。作为同志，不妨谈谈我的意见。

一、我对于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估计。

我对于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缺乏全面的了解，不可能作出准确的估计，只能说一点自己的观感。从有限的观感来讲，我以为当前古典文学的研究，同过去一段时间比较，是有所开拓的，不能算是“封闭”。这表现在：研